

马克思和王茂荫的两次交集



公元1854年，时值茶季，北京的徽州茶商欲以宫廷购茶所得的“官票宝钞”至“天下第一税关”崇文门税关纳税，却遭税吏拒收。这一事件使马克思和王茂荫产生了交集。

第一次交集： 马克思《资本论》 对王茂荫货币政策的引证

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第一卷中论述信用货币时，写下了一条注释：“但不妨顺便提一下，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，信用货币的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。”其注释称：“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，主张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。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，他受到严厉申斥。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，不得而知。审议报告最后说：‘臣等详阅所奏……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。’”

这一引证的背后，是王茂荫一套完整的货币改革思想与实践。曹天生教授《王茂荫集·王侍郎遗稿》收录的《为钞不畅行请禁民用银折》显示，他彻底提出了：“为钞不畅行，请禁民用银专用钱钞并先博施济众以藉流通而裕国用事。”

同时，他系统规划了纸币发行与管理模式。《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二级谕赐祭葬显考子怀府君行状》记载其构想：“臣之初意不独京城银号各商欲令立一总局，以期上下流通，并欲令各省都会银号均立总局，以期往来流通。现在时势所阻，臣之意已不能行，各条章程皆系户部所定，不过收放之间稍有参酌。”

王茂荫提出的“可兑现纸币”方案及其“中央银行模式”雏形，因其触及现代信用货币与金融管理的核心，成为《资本论》中引证

的中国金融思想案例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《资本论》中唯一被提及的中国人。其货币改革思想具有显著的前瞻性，但在腐朽的清朝体制下，这些触动统治根基的先进思想注定无法实现。

《再议钞法折》中的悲情陈词，正是其赤子之心与报国无门的真实写照：“抑臣更有请者，现行官票宝钞，虽非臣原拟之法，而言钞实由臣始，今兵丁之领钞而难行使者多怨臣，商民之因钞而致受累者多恨臣，凡论钞之弊而视为受害者莫不归咎于臣，凡论钞之利而迫欲畅行者又莫不责望于臣，而臣蒙恩擢任户部业经数月一无筹措，上负天恩，下辜民望，夙夜愧悚，实切难安，相应请旨将臣交部严加议处，以谢天下而慰人心，庶几浮言稍息。臣虽废黜，不敢怨悔。”

其个人悲剧，深刻印证了封建制度难以进行实质性自我革新的历史困境。

第二次交集： 马克思茶叶 关注的呼应

在《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》中，卡尔·马克思于《资本的流通过程》中论述道：“无论商队运来的茶叶，还是由海上从广州输出的茶叶，都是来自同一些灌木，同一些茶场：红茶主要来自福建省，花茶和绿茶主要来自安徽省。”

此论述与王茂荫的家族事业及清廷职务产生了具体关联。

马克思所称“由海上从广州输出的茶叶”中，安徽省绿茶更准确的定位便是王茂荫家乡徽州的“屯绿”。王茂荫早年科场不顺，曾于道光十年（1830）赴北京通州先是管理家族“森盛茶庄”店务；后于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考中进士任户部主事。

据王茂荫族人、茶叶专家王郁风在《〈资本论〉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王茂荫出身业茶世家》中考证：“王茂荫于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在北京考中进士，同年即入户部任职，先后授主事、员外郎、监察御史和侍郎。在户部任职22年（1832—1854），那时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由广州口岸‘十三行’经营，而‘十三行’由清廷户部管理。王茂荫便是参与管理‘十三行’人员之一。”

王郁风先生作为中国现代茶业体系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参与制订和完善了我国制茶工业经济技术管理体系，创办《中华茶人》杂志，出版《中国茶叶五千年》《中国——茶的故乡》《中茶史录》《茶叶出口统计》等著作，为中国茶业发展留下宝贵文献，其考证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。

广州十三行是当时海上茶叶

输出的唯一渠道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后实行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，促使徽商“漂广东”从事茶叶出口。清代形成了以屯绿茶为主的出口体系，珠茶、雨茶、熙春等品类通过十三行销往欧美，波士顿倾茶事件中被销毁的茶叶即包含松萝茶和熙春茶。

《徽属茶务条陈》记载徽茶为出口大宗；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），广州出口英国茶叶4500担，其中1500担为徽州松萝茶。明清之际，徽州作为中国的茶叶精制与贸易中心，堪称帝国的“茶务都会”，《茶酒论》中即有“浮梁歙州，万国来求”之说。

“万里茶道” 与花茶创新

马克思所称“商队运来的茶叶”中，安徽花茶主要指泛徽州区域至德县的珠兰花茶。“万里茶道”自清代雍正五年（1727）《恰克图条约》签订后逐渐形成，其西线在咸丰年间《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》签订后开辟，专门贩运安徽至德县所产朱兰花，经西疆运至库伦、塔尔巴哈台，再由俄商转贩欧洲。此线贸易虽不足十年，但马克思所言的安徽花茶正源于此。

西线花茶能成为成熟大宗商品，与王茂荫的创新密不可分。

王郁风《〈资本论〉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王茂荫出身茶业世家》考证指出：“王茂荫为官，出入清宫，了解慈禧辈泡茶时加入金银花、茉莉鲜花，增加香气的习惯。受此启发，他便仿用清官用香茶薰制鼻烟的作法，用珠兰、茉莉等鲜花窰制徽州家乡的大方片茶，试销北京，深得八旗子弟和华北气候寒冷地区人们的赏识，故早期的花茶称为“香片”。

我国在明代有薰香茶的记载，但在市场上未形成规模商品，而在咸丰年间（1851—1861），北京地区陡然兴起花茶规模商品，逐步发展成统领三北茶市的大品种。森盛茶庄和王茂荫起了重要的引导与开拓作用。由于经营花茶时新品种获利较丰，带动徽州歙县人士到北方做茶叶生意，加之歙县在北京设立“歙县会馆”，便利科举士子居停和商业联系，故北京早期的茶庄大多都是歙县人士所开设，称为“徽帮”，其原因都与此有渊源关系。

王茂荫的货币 与贸易视野

深厚的家世背景与丰富的从政阅历，共同塑造了王茂荫极具前瞻性的经济主张。

在《再议钞法折》中，他提出“先求无累于民，而后有益于国”

的立法准则。这清晰地表明，其“民本”财经思想并非空泛的理论，而是源于对茶商等具体商业实践的深刻体察。

《请刊发〈海国图志〉并论求人才折》中的论述，体现了他超越时代的宏阔视野：“方今海外诸国，日起争雄，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，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异。”

在绝大多数同僚固守“华夷之辨”时，他已清醒认识到全球列国竞争的新格局，其“天下一家”的思想，是对传统天下观的突破，更是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认知。

通商为安民治国之本。在《请筹通商以安民业折》中他强调：“窃思京城为根本重地，必得商贾流通，百货云集，方足以安民生。”王茂荫将商业繁荣视为国家稳定的基石。

货币流通依赖于商人。在《再议钞法折》中深刻指出：“非有商人运于其间皆不行；非与商人以可运之方，能运之利，亦仍不行。”认识到商人及商业运营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。

国际贸易需行银票以便流通。主张“现行银票、钱钞，均属天下通行。而行远，要以银票为宜。欲求行远，必赖通商；欲求通商，必使有银可取。”洞察到信用工具对拓展外贸的重要性。

洞察西方经济侵略，主张斗智争利权。在《请酌量变通钱法片》中敏锐指出：“彼夷人乃从容而以钱易银，贱入而贵出之，即此一端，利权已全为所操，他且勿论。此事无从斗力，惟宜斗智。”识破了西方通过货币兑换进行经济掠夺的本质。

主张学习西方，寻求御夷之法：秉持开放务实的态度，主张学习西方长处，《请刊发〈海国图志〉并论求人才折》中强调“法赖人行，则更须求人之法”，将人才视为实施新法的关键。

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九日，王茂荫上《请刊发〈海国图志〉并论求人才折》，其开放务实、寻求自强的观点，与马克思、恩格斯所言“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，反而起了惊醒作用”的历史判断相呼应，预示着古老中国必然在变革中重获新生。

马克思、恩格斯高度评价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，正如“火药、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”一样，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中的货币思想、生产与贸易体系同样“具有光辉历史意义”。

曾经，马克思、恩格斯期待“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”；今天，曙光已化为朗照东方的皓日当空。

王潮涌
来源：《中华读书报》

王德三 给父亲的遗书

“你的儿子是这世上最刚强、最志气的人，他只知道人类，只知道社会，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习气。”

这是曾任中共云南第一届省委书记的王德三烈士，牺牲前在狱中写给父亲的遗书中的内容。彼时，他已十余年未与父亲相见。在信中，他向父亲诉说着深情与决心，表明自己即将把生命献给人类解放事业。这封信写完后的39天，1930年12月31日，他在云南昆明英勇就义，年仅32岁。

王德三，1898年出生于云南大理祥云县王家庄村一个普通家庭。1921年，他考入北京大学，参加学生爱国运动，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。1922年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6年春赴广州到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任政治教官。1928年夏赴苏联莫斯科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曾被选入大会组织、宣传、军事等委员会并在大会上发言。1930年1月，王德三当选为中共云南第一届省委书记。在白色恐怖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他领导云南各级党组织和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。

王家“一门三英烈”，王德三的长兄王复生、弟弟王馨廷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更令人敬佩的是，王德三的妻子马冰清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，受尽百般折磨，始终坚贞不屈。怀有身孕的她还在狱中生下了他们的儿子王纪中。可惜王纪中7岁时不幸夭折，这对革命伉俪的骨肉没能得以保存。

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、人民的自由幸福，像王德三一样的革命先烈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改变千万人命运的革命洪流之中，在生与死面前，他们坚定地选择了舍生取义，这是共产党人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，其理想信念的薪火将代代相传。

综合